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

耶鲁毕业生调查启示：

专业低门槛流动“造福”学生成长

■郭英剑

不久前，美国耶鲁大学在其校刊公布了一项调查，旨在了解 2025 届毕业生的在校学习与生活经历，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其中的三项内容——自由转专业、文科受欢迎、就业新状况引发了我的关注。

在我看来，这些内容为理解“专业”与“职业”间的关系提供了鲜活样本，也会给国内正面临志愿填报的考生带来一些启示。

上大学不应是“上专业”

耶鲁大学的调查显示，仅有约四成半的学生在入学时填报的专业毕业。换言之，超过半数的耶鲁本科生在大三前完成了转专业或双专业调整。

这说明在转专业问题上，耶鲁给予了学生充分的自由，也意味着学生入校时的专业选择并不那么重要。只要大学允许学生在早期灵活试错、低门槛流动，后者就一定能够找到喜欢的专业。

学生在十七八岁时的志愿，即便有亲朋好友帮助，也不过是一种“预判”，其真正的兴趣与能力往往要在课堂与实践反复碰撞才能显现。如果院系壁垒过高、转专业手续烦琐，学生就可能被迫在不合适的赛道上消磨四年时光。反之，耶鲁式的自由流动则为学生重新定位、重组课程，乃至走跨学科新路径提供了跑道。

这让我想到国内很多高校实施的“零门槛转专业”政策，各专业对转出人数、成绩排名不做限制。我以为，这是国内高校教学与管理走向成熟、自信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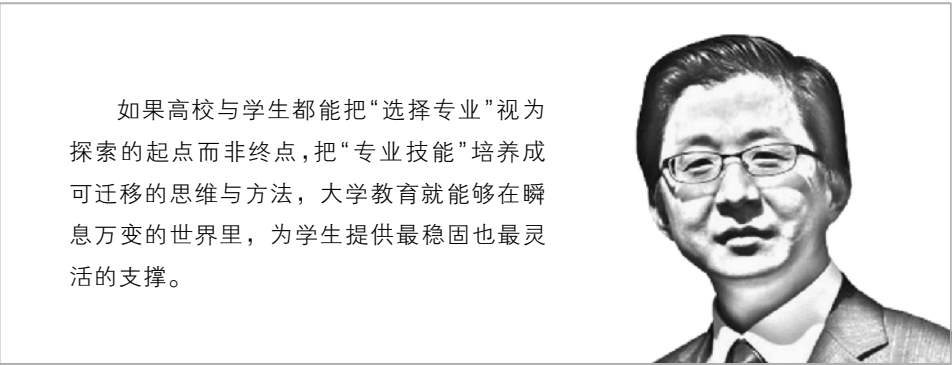
要知道，“零门槛转专业”的核心是将学生放在学习选择的主体位置，其有两个前提逻辑。一是高考志愿填报时的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局限，使不少新生对所选专业缺乏真正的了解；二是人的兴趣、潜能和职业规划会在大学阶段迅速更新。因此，放宽转专业限制的实质，是尊重个体发展的探索权和纠错权，用更低的制度成本纠正“人口一次性决策”的弊端。

不过，从短期看，转专业“门槛”的降低，会引起热门专业的转入申请更加集中，传统的“冷门”专业则可能流失学生。这是否会加剧冷热专业的分化？

最近，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宣布今年同批次、同类型的新生，入校后可以自选专业。事实上，该校去年就已经这样做了。我曾询问过校方，此举是否会引起冷热专业的分化。对方回复，他们做了专业宣讲，并准备了相关预案，但最终学生们的选择比较理性，并未出现专业“冷热不均”现象。

在我看来，该校的方案值得在全国推广。但从理论上说，冷热专业分化问题在现实中仍有可能出现。如果出现，是否应继续放开？

在我看来，开放仍应继续，但可以考虑分层、分阶段进行，比如采取“自由转出+适度准入”措施，即转出保持零门槛，转入则依据专业资源承载力和学习准备度设置基础能力



如果高校与学生都能把“选择专业”视为探索的起点而非终点，把“专业技能”培养成可迁移的思维与方法，大学教育就能够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为学生提供最稳固也最灵活的支撑。

线，如先修课程、学分绩点、面试或项目经历等。这样既尊重了学生选择，又能守住专业培养质量。同时，也可以考虑“动态资源分配机制”，比如以两年为周期，依据转专业数据、毕业生流向和师资配置调整专业招生计划并给予经费倾斜，让资源跟随学生真实需求流动。

早在 2017 年国内很多“双一流”大学纷纷推行“大类招生”时，我就曾提出，依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未来 10~15 年的时间“双一流”高校将取消大类招生，让学生进校后自由选择专业，从而实现真正的“上大学”。如今还不到 10 年，一些高校已经提前这样做了。我相信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走上这条路。

有人可能认为，当下的“自由转专业”不过是高校间竞争生源的“营销动作”，但我觉得倒不如将其视作高等教育走向以学习者为中心、以真实需求为驱动的体制升级。放开不是放任，而是通过“自由选择—资源跟随—质量把关”的闭环，让热门更精、冷门更专，最终形成多样化的人才供给。

文科仍具含金量

耶鲁大学的调查还显示，该校 2025 届学生的专业分布几乎“三分天下”——理工科、传统人文与艺术、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各占 1/3。

这一格局至少释放出三重信号。

首先，文科仍具魅力。在强调“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才有前途”的舆论高压下，耶鲁依然有大量学生自愿选择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史等，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

一是深度兴趣驱动。耶鲁的通识体系允许学生通过大量旁听、试错，把“喜欢什么”与“擅长什么”对齐。二是软技能溢价。雇主越发看重批判性思维、跨文化沟通与叙事能力，这些正是文科训练的核心产出。三是跨界机会。人文专业与数据科学、公共政策、可持续发展等方向的双专业、辅修或项目制合作，为纯文科生打开了“技能叠加”的上升通道。

其次，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成为“新磁石”。1/3 的学生选择政治经济、全球事务、认知科学等交叉专业，说明文科与理科的传统壁垒全被快速打破。学生在学习结构方程模型

的同时也写政策备忘录，在阅读希罗多德的同时也做地理信息系统（GIS）可视化，“通讯+专精+工具”式路径正成为主流。

最后，通识教育为文科续航。耶鲁注重本科生在入学前两年对语言、写作、量化推理、艺术实践和实验科学等的学习，以多样的“学科体验”帮助其确认兴趣，再通过“自由转专业”降低方向切换成本。这既保住了文科生源，也让“学以致用”不必局限在传统职业配对中。

反观国内，近年来，很多大学专业调整的风向标频频指向文科。人们发现，文科专业成为专业裁撤的重灾区，甚至很多过去的重点文科专业被大规模边缘化。一些院校将更多招生计划倾斜至“智造”“大数据”“储能”等新工科。

我以为，文科可以“瘦身”，但不能被简单裁撤或削弱，而应让其实现“去粗取精”的升级，要让文科院校/系从“守摊式开设”转向“定位式精耕”，让人文学科真正回归其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在当下的高等教育转型期，文科至少有三重竞争力是不可替代的。

第一重竞争力是跨文化理解与叙事。只要谈及国际传播、地方形象塑造或企业出海，任何机构都离不开跨语言、跨文化解码与再编码信息的人才。这些能力来自对史料与文本的深度阅读，也来自对不同时空话语逻辑的洞察。在校期间，文科生若能不断训练如何将复杂议题讲给不同受众，其在职场上就拥有了天然的“翻译—叙事”优势，这一点是被世界五百强与跨国机构反复验证的。

第二重竞争力是批判性思维与历史纵深。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价值取向和制度架构同样决定科技走向。文科训练让学生不断回到证据—论证—反驳的链条中，学会拆解叙述背后的假设、利益与意识形态。如果说理工科锻造了解决方案的能力，文科则培养了提出正确问题并审视底线的能力——后者对于公共政策、企业战略、科技伦理尤为稀缺。

第三重竞争力需要文科主动嫁接数据素养与数智工具。过去常见的“纯文本”路径已难以应付大数据时代的公共话语竞争。将量化分析、可视化等方法融入传统研究，让文科生在讲故事的同时，拥有数据佐证，让历史系

人文社科成果：如何从“被动走出去”到“主动留下来”

■刘爱生 王玲玲

据统计，2024 年我国学者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发文总量达到 56688 篇，占全球 SSCI 发文量的 16.93%，涵盖 50 多个研究领域。在艺术与人文科学索引(A&HCI)期刊发文的总量目前尚缺乏统计，但预估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发表，初衷是回应国家早先提出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该计划实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扩大我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国际话语权。显然，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重要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主动走出去”。

但只要稍微留心观察就可以发现，当前我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发表发生了明显转变，即日益从“主动走出去”转为“被动走出去”。

多原因致人文社科成果“被动走出去”

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产生这种转变，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

一是国内不尽合理的学术评价制度。当前，在我国高校的学术评价制度中，SSCI 期刊权重普遍高于国内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以下简称 C 刊)，甚至在某些地方高校，SSCI 论文等同于国内的权威期刊。这使得在教师职称评定和绩效奖励中，发表 SSCI 论文具有明显优势，以至于某些在境外刚刚毕业的博士，仅仅因为发表了多篇 SSCI 论文，就直接被国内高校聘为教授。这类新闻虽然意在强调大学在学校人才招聘时不看资历，不论年限，但无形中却抬高了 SSCI 期刊的作用和地位。

二是国内愈加拥挤的发表空间。我国大部分高校将 C 刊论文作为教师学术评价和博士生毕业的重要依据。在国内其他刊物上

发表的文章，即便质量再好也不算数。但一方面，C 刊数量相对较少。2023—2024 年，入选的 C 刊总共 660 种，其中还包含我国港澳台地区期刊、报纸理论版。同一时间，SSCI 期刊目录则包含 3548 种，A&HCI 收录的期刊数量为 1843 种。

另一方面，C 刊发文量越来越少。有学者统计，我国 C 刊发文量的最高峰为 2009 年的 102163 篇，此后便一直走低，到 2023 年仅 69141 篇。换言之，C 刊发文量在过去 10 余年间下降了近 30%。同时，国内文科学者和文科研究生的数量却逐年攀升，C 刊的发表难度与日俱增。不少大学教师表示，当国内“卷”不动时，只能往外“卷”了。

三是国内不太规范的审稿和用稿制度。国内许多学者和博士生选择 SSCI 期刊投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期刊编辑对中国论文的作者大多并不熟悉，反而可以做到一视同仁。此外，SSCI 期刊大多有透明的审稿流程和详细的反馈意见，即使文章没有被录用，其反馈意见也让人受益匪浅。相对而言，国内不少 C 刊存在作者歧视、学校歧视以及人情稿的情况。例如，有些 C 刊明里暗里表示不收录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还有不少 C 刊对于拒稿不给予反馈意见。更糟糕的是，不少 C 刊为了提升期刊影响力和被引总数，越来越多地向知名学者约稿和组稿。甚至有某 C 刊主编透露，专家约稿占其年度发稿量的 90%以上。

如何让更多成果“主动留下来”

应该承认，日益增多的国际发表，极大提高了我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能见度”。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大量“走出去”的论文质量参差不齐的同时也不乏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精品佳作，但由于语言隔阂、出

版商垄断等原因，它们宛如遗落海外的国宝，往往不能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和重视，更难以在国内产生实质性的社会影响，最终“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毕竟它们耗费了我们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也与我们近年来倡导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相去甚远。

那么，如何改变人文社科成果“被动走出去”的状况，尽可能地让更多精品佳作“主动留下来”？

首先，要重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一方面，坚决破除当前学术评价中“崇洋媚外”现象，即过度拔高 SSCI 期刊论文的权重；另一方面，坚决破除国内期刊评价“只认 C 刊”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学术评价政策时，不能以期刊来源、期刊等级、影响因子等表面指标为核心依据，坚决取缔“以刊评文”的简单化评价模式。

事实上，一些 SSCI 期刊因同行评审缺失、快速接收文章、收费高昂等特点而被列为掠夺性期刊，此类期刊并不能保证论文质量；反之，当前国内许多所谓“普通刊物”的办刊水平越来越高，其刊发的论文质量未必比 C 刊差。要打破“以刊评文”，就意味着在学术评价时，应根据论文的理论创新和社会影响对其质量做恰当评价。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完善同行评议制度，不断提高同行评议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其次，科学有序扩大《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建立与人文社科学者数量动态平衡的“扩容机制”。鉴于“以刊评文”现象在短时期内难以被打破，以及过去 10 余年 C 刊论文数量不断下降，人文社科学者数量却不断攀升的现状，作为引文数据库的 C 刊有必要认真思考扩容问题。

科学有序扩容不仅能在相当程度上减轻

学生会做 GIS 热力图，让中文系学生能用语料库验证修辞趋势，这才是真正的“新文科”。

基于上述三重核心价值，高校的文科“瘦身”不应简单砍掉，而应该重组。比如，将过度细分却师资薄弱的小专业整合成跨学科平台，例如把国际关系、区域研究、外国语言文化并置，形成“全球文明与国际传播大类”，再通过模块化培养和“微专业”灵活加码。如此，既保留了经典文本与方法论，也让文科教育直接对接社会和产业的真实场景。

所谓“瘦身”，也是一种动态调节，如此才能让文科整体生态保持活力而不过度空心化。但必须指出，一切动态调节都要回到人才培养的终极指向上。即便在技术迭代日新月异当下，人类仍需要能理解差异、构建叙事、守护底线、协调冲突的“文化架构师”。

这恰恰是精炼后的文科专业最无可替代的价值。在这条道路上，缩减冗余的目的不应是自我削弱，而是把资源和学生的注意力聚焦到真正培养未来公共精神与全球视野的课程与项目上。这一点一旦坐实，文科不但不会被裁撤淹没，反而会以更加精准且具有穿透力的姿态，在新的时代浪潮中重获力量。

专业与就业“错位”是常态

耶鲁大学的调查问卷同时揭示了毕业生的就业去向——1/3 的学生继续深造，2/3 的学生直接工作，其最热门的工作板块是咨询(24%)、金融(21%)、技术(21%)与科研(21%)。这份调查虽未逐一列出“专业—行业”对应表，但若将这些行业与学生的本科专业对照，仅从数字上(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的学生占据 2/3)就可以发现一种高度“错位”——文科学生会出现在投行报告、战略咨询的团队里；理工科背景的学生也可能投身公共政策、非营利研究甚至文化创意。

可见，企业和机构真正看重的是毕业生是否具备结构化思考、批判性阅读、跨文化沟通、数据洞察与快速学习等可迁移能力，而非专业本身。专业与职业之间的这种“松耦合”(即两者的关系并不紧密相连)，正是高流动性职场与交叉创新时代的正常生态。

这一数据也提醒高校，应继续打破院系边界，让学生在入学前两年广泛选修跨院导论课、完成兴趣测评并进行职业体验，再进入更具深度与模块化的二次选择。

在我看来，耶鲁大学的这份调查印证了两层共识：第一，专业流动的自由度越高，越能激发学生潜能，也越符合毕业后多次转岗、终身学习的现实；第二，大学专业与就业行业并不必然一一对应，真正决定职场竞争力的是跨情境迁移能力与持续成长意愿。

如果高校与学生都能顺应这一逻辑，把“选择专业”视为探索的起点而非终点，把“专业技能”培养成可迁移的思维与方法，大学教育就能够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为学生提供最稳固也最灵活的支撑。

国内学术发表的“内卷”，而且能使更多人文社科成果“留下来”。对于很多年轻学者来说，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也不会费尽周折“出海”发表。需要补充的是，当下许多“普通刊物”正在努力提高办刊质量，其刊文质量未必低于 C 刊。这意味着即便增加 C 刊容量，也不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

最后，优化国内学术出版流程，建立、健全审稿和用稿机制。

在这方面，一是要完善审稿制度。在坚持“三审三校”基础框架的同时，实施分级动态审稿模式，通过设置不同专业和层级的评审专家库，实现精准匹配。建立可追溯的电子审稿档案系统，确保所有评审意见永久存档备查，强化过程监督。

二是建立问责机制，构建“事前防范—事中监控—事后追责”的全链条监管机制。针对审稿中可能出现的人情评审、利益输送等违规情形，制定明确的处罚细则，实行责任倒查制度，对涉事人员采取学术禁入等惩戒措施。

三是优化反馈机制，构建“全周期作者服务体系”。这要求期刊在约定周期内完成评审并反馈结果，同时提供包含具体修改建议的差异化评审意见。此外，还要公开审稿流程各环节时间节点，通过增强服务透明度，提升作者体验，促进学术共同体良性互动。

总之，当下我们需要重视海量人文社科成果“被动走出去”这一现实问题，正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着力化解这一问题。切莫一边空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边又不给学者们提供“用武之地”，甚至逼迫他们“背井离乡”。

(作者分别为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教育研究院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虹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张端鸿

『自主选择』是高考后最需被看见的能力

每年高考结束，意味着又有一大批年轻人要准备回答一个“我将成为谁”的重大问题。然而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往往不是沉静的思考，而是紧张的计算；不是向内追问，而是向外打听。志愿填报本该是一场青春与命运的庄重会面，却变成一场信息战、心理战，甚至是一场家庭权力的较量。在这场看似自由却高度结构化的选择游戏中，一个极其关键的能力被长期忽视。

这个能力便是真正的自主选择能力。

众所周知，高考是一种高强度的筛选机制，但很少有人追问，在筛选之后，我们想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学生在走出高考考场的那一刻，本该迎来的是一个思考自我、建构未来的起点。但现实中，他们却被迅速推入一种更焦虑、更功利的逻辑中——你的分数值多少钱？你的志愿是否“最优”？你能否“每一分都不亏”？于是，原本属于青年的关于“我是谁、我想成为谁”的追问，几乎被“我能上哪里、我该选什么”彻底取代。

必须承认，填报志愿本身并不难。在高考录取规则高度透明、信息平台日趋成熟的今天，平行志愿为考生提供了极大的选择容错空间。对于完成了整个高中学习的年轻人来说，操作层面的填报志愿早已不是能力门槛，而是一种本该自我承担的实践任务。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怎么填”，而在于“我想填什么”。

遗憾的是，现实中许多考生并不是因为操作难度大而求助他人，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做错选择、害怕承担结果，最终干脆交出决定权。他们不是不能自己填志愿，而是不敢有自身的偏好负责、不愿承担不确定性。于是，“替你选一个保险的”成了志愿交给老师、专家、父母“变得合理起来”。

我们不能将这一现象简单归因于学生“只看就业前景”。事实上，这种“无法选择”的困境背后，是整个教育系统、家庭文化与社会期待对个体判断力的系统性压抑。

比如，父母习惯于将志愿填报视作一次家庭资源的配置，倾向于用“回报率”衡量某专业是否值得选择；学校教育又往往更注重学生成绩、名次，而非学生的自主规划、价值判断、风险评估能力；“热门专业”“就业率排行榜”等概念的盛行，又在无形中绘制了一张看似科学、实则狭隘的路径地图，把选择的价值压缩为“能否找到工作”“能否月薪过万”。

正因如此，我们才强调高考后，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分数单，而是年轻人第一次有机会学习作决定的能力。真正的自主选择不是“任性”地脱离现实或“一意孤行”地拒绝建议，而是有意识地面对复杂信息，在兴趣、能力、价值、机会之间作出阶段性的平衡判断。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现实——总有人会在高考中“失利”。而这些学生和家长往往会天然地认为“失去了选择权”，仿佛分数的下滑意味着人生天花板的下沉，甚至只能“捡”剩下的志愿、专业与未来。

事实上，真正决定一个人未来发展高度的并非分数，而是能否找到自己愿意持续投入的志趣领域，同时给予其与个人能力相匹配的专注并坚持下去。

很多时候，人们把高校分层看得过重，却容易忽略专业、个体之间在投入深度与成长轨迹上的巨大差异。在多元社会，无论身处何种学校，只要你选择了一个真正值得投入的方向并长期耕耘，总会迎来重获主动权甚至反超的可能。

然而，现实并没有给这些年轻人提供足够的试错空间。在很多高校，大学专业一旦选定就难以轻易转换。多数父母也更希望孩子选择“最不容易出错的路径”，而非“最能激发成长的路径”，甚至学校在志愿指导时，也更愿意成为“信息中介”而非“成长伙伴”。

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学生初入高校便已经陷入迷茫，很多人在毕业后重新审视当初的选择，却发现为时已晚。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建立一种“欢迎自主选择”的教育文化。这意味着家庭要能接受探索的成本，不把试错当作失败；学校要给予学生延迟决定的制度空间，如宽松的转专业政策、跨学科学习平台等；社会也要从单一的“成功路径”想象中走出来，承认人生轨迹的多样与可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语言、情感和制度等层面给予学生这样的信号——你有判断的能力，你的兴趣和困惑都值得被认真对待，你有权为人生试一次。

总之，我们要告诉那些正要填报志愿的学生，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选择可以确保“不吃亏”。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只能在一次次愿意承担后果、愿意从失败中成长的选择中建构出来。

同时，我们也要告诉学生的父母、教师、咨询者，真正的指导不是给出正确答案，而是营造出可以判断、可以试探、可以犯错、可以成长的氛围和空间。我们不敢替他们选择，但我们可以用理解和支持，让他们敢于选择、愿意负责。

须知，教育从来不是将学生送入大学了事，而是让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不再害怕选择。